



郭予元

Guo Yuyuan

郭予元

农业昆虫学家。1933年1月1日出生于上海市。1953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长期从事植物保护研究、教学、推广工作,为我国农作物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策略的制定和实施作出重要贡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项。出版专著22部、译著2部,发表论文197篇。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3年元旦,我出生在上海一个“有钱人”家,父亲原是屈臣氏汽水公司总经理,由于经营不善和擅自捐资上万银元给精武体育会等原因,赔光了股份,在我3岁时破产。从我记事到哥哥姐姐工作之前,家中生活拮据,有时等米下锅了,还在翻箱倒柜找东西去换钱。家庭的破败加上“八一三”上海沦陷,磨炼得哥哥姐姐们都比较懂事,父母忙于全家人糊口,孩子们全靠大的照顾小的。在姐姐的启蒙下,我4岁半就上了小学。学习很吃力,但我不肯退缩,硬着头皮跟班走,到小学四年级就半懂不通地看《水浒传》、《三国演义》,并被书里的英雄豪杰所折服。那几年父亲到汕头开了个小米铺,为节省上海家中开支,1942年由19岁的四姐带着三哥、六姐和我四个人回汕头老家去上学。刚去时话听不懂,上课如听天书,在四姐的帮助和管教下,

我慢慢跟上了学业。当时是抗日战争年代,汕头是沦陷区,常有盟军飞机空袭,1945年4月末的一个晚上我们正睡着,一颗重磅炸弹正落在我们街区,我家的房子也被炸得只剩下前半边,当时三哥和我吓得钻到墙角,听到父亲和四姐的喊声才战战兢兢地跑出来。家被炸毁了,只好暂住在亲戚家的阁楼上。不久,日本投降了,侵略者被赶走了,家中生活虽很清苦,但是很快活。南方习惯加上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我初三时还常打赤脚上学,一次全市学生上街欢迎来访的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和国民党的何应钦将军,队列已经整好了,校长发现我没穿鞋,当场把我拉出了队伍,让我很没面子,心想我穿戴不如你们,学习要超过你们!学习更认真了。回上海读省吾高中时,学校规定凡考第一名的可以免交学费,我为给家里节省开支,努力学习,高中有五个学期考了年级第一名。

1949年上海解放了,我这年考大学。解放第一年实行各个大学错开考试日期分别招生,我报了金陵大学昆虫系、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清华大学昆虫系、东吴大学生物系5所大学,先后都被录取了。三姐说“清华是国立的不用交学费,名气又最大,就上清华”,我于是到了北京。谁知去清华大学报到时被告知农学院已合并到其他学校了,一同从上海来的30多名学生听后都很震惊,有的表示“我是慕清华之名而来,既上不了清华就上不了”。我情绪也很大,真想立即回上海,“说不定那4所大学中还有能上的”,可当时缺钱,没敢行动,很不情愿地成了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

北京农业大学是由北京大学农学院(由建于1905年的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清华农学院(前身是1921年建立的清华学校农科)、华大农学院(源自1940年建立的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生物系)合并而成,师资力量、设备条件等等当时都是一流的。我读书时有刘崇乐、陆近仁、周明群、戴芳澜、俞大绂、汤佩松、胡秉芳等国内外知

名教授都亲自为我们授课。另一方面,通过学校的政治课和社会活动,我思想觉悟也得到提高,开始了解什么是革命,了解到今天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前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盼国家独立富强,就必须肯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既然已上了农大,就要负起责任,我决定安心农业,为发展祖国农业科学而奋斗。在校期间,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教育体制改革等运动不断,还抽调学生参加抗美援朝和组织大批学生参加土地改革,正常的教学秩序常常被打乱,有些老教授受到猛烈冲击……政策上曾走过弯路。但学校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到农场劳动,组织学生在假期到农村参加治虫运动,这些举措是正确的。我们这一代人能在工作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怕苦、不怕累,能与农民打成一片,具有深入田间调查研究等作风,与在校期间所受教育有密切关系。

1953年临近毕业,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不能去流血保卫祖国,就应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建设祖国”,多数人在毕业生登记表上填了“服从组织分配”。1953年9月3日孙晓邨校长宣布毕业生分配名单,有16人分配大西北,其中植保系10人,我和另一同学分配宁夏。据说这个交通不便的边远小省还很不开化,经济落后,生活用品贵,有人还劝我们多带些牙膏、肥皂之类。我们那时不知道找条件好的地方去工作,认为正因为边远地方落后才需要我们去建设,因此对这样的分配方案是愉快接受的。到西北的16个人先一起坐火车到西安再各奔东西。我们去宁夏的客运汽车是敞篷大卡车,一路上尘土飞扬,经受了两天半的颠簸到达了省会银川。那时银川市的规模也就相当内地一个小镇,全市还没有一座楼房,省政府也是一排平房。一条主要的解放大街也没有铺柏油;有电灯,但水是靠水车送或从井里提水。我被分配到省农技推广站,另一同学分配到省内唯一的农业教育单位——永宁农校。条件与北京没法比,也从没想过和分到大城市大单位的同学

比,面对陌生的环境,只想早点接受任务。当时新的大学本科生还很少。我们被认为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第一批大学生,处处要求自己比较严格。下农村没公交车,都自带行李和生活用品,捆在自行车上骑车去,最远的要骑200多公里。我白天下地调查农作物病虫害的发生情况,向农民宣传推广病虫害防治技术,晚上带着问题,在油灯下查书寻找答案,有时召开群众会介绍防治方案。冬前写出书面报告上交当地政府和省站,再回到单位上班。冬季在站上学习业务,为基层农技推广员举办技术培训班和参加省厅的各种政治运动,只要自己抓紧,有大量时间可以利用来补充理论知识和开展室内实验。那时凡是有关农作物病、虫、草、鼠危害造成损失的问题我都愿意探讨,还学习掌握宁夏农作物耕作栽培制度和气候变化规律,以扩大自己的业务知识面。经过2年多的磨炼,我已喜欢并适应了这种工作,看到自己学到的知识能为人民服务,心里很高兴。正当我在推广站干得起劲时,上级决定把我调到当时省内唯一农业研究单位——王太堡农业试验场水稻组。

在宁夏引黄灌区,水稻是主要农作物之一。那几年稻瘟病常暴发成灾,急需系统研究此病的发生规律和有效防治对策。该组负责病虫害防治的就我一人,单田间不同田块定点系统调查记载病情发展变化,和定时更换病菌孢子捕捉器上载玻片等工作,每天就要在稻田干四五个小时,室内还有盆栽试验、查阅文献资料、分析气候数据与病情变化的关系、尝试用调查数据组建稻瘟病预报模型等工作,还要参加每周雷打不动的半天政治学习,忙得不可开交,暑热伏天也很少能午睡。宁夏习惯在稻田施羊粪,炎热的夏天,稻田水都发酵,会引起一些人腿上生出“痒疯疙瘩”。我的两腿被水泡的部分全起了脓疱,人们说远看我像穿着一双黄靴子下稻田干活。超负荷工作,集体活动时还帮别人干,老工人看我都心疼了,唯独1935年参加红军的

党委书记不但看不见,反而常找碴儿训斥。后来才闹明白原因:在业务场长老专家马寿桃的支持下我报考研究生,但随后场党委给北京农大招办追发去电报“此人历史未做结论,不宜录取”。原来我被怀疑隐瞒年龄列入“审干对象”,加上有海外关系,不恋大城市愿到宁夏这么努力干,怀疑我一定有政治目的。好在我全力投入工作,干有效率的工作是我最大的乐趣。经过忍辱负重的辛苦,换来了能用7月雨量雨日较准确预测8月稻瘟病发生程度、用前期叶瘟病情较准确预测后期穗瘟病情的预测模型,以及高效控制稻瘟病的药剂防治技术规范。这些工作得到业务领导和省内农技推广部门的认可,心里感到很值。1956年末,上级调我参加稻瘟病防治考察团到全国几个主要稻区考察,1个月后回到银川时,我已被调回农技推广站。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成立回族自治区,宁夏各方面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第二次到技术推广岗位时条件比以前大有改善。但新划入自治区的西海固地区农业生产水平很低,农民生活贫困,粮食作物病虫害发生严重,急待解决。为此我被派到西海固蹲点搞病虫害调查研究和开展试验示范。在同事和当地农技站的协助下,坚持几年努力,终于弄清了陕甘宁交界区冬麦上严重发生的麦种蝇的发生规律和用辛硫磷拌种高效控制其危害的方法,用六氯代苯处理种子将大面积小麦腥黑穗病由20%~40%的病穗率压低到0.1%以下,试用0.5%六六六粉精量拌种消灭农户储藏期豌豆种内的豌豆象取得成功,用0.05%新洁尔灭(医用消毒剂)控制防护林杨树上的腐烂病,等等,我一时成了颇受群众欢迎的人。

1960年我被调到永宁农校当教师。我自己并不想常换单位,但是如果工作需要那就应该服从。我想只要认真,干什么工作都能从中发现值得钻研的东西。我非常欣赏当时的“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这一口号。由于对生产情况和新的知识信息比较了解,讲课时受到学

生的欢迎。调农校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宁夏是“浮夸风”的重灾区,职工定量每月2两油、3两肉、21斤粮,由于营养不足,许多人对未来失去了信心,无心提高专业。我不能因挨饿引起营养性浮肿而放松学习和工作,试着为师生培养“可以补充人体营养的”人造肉菌、链孢霉和可以促进蔬菜生长的赤霉菌,并负责值夜班控制炉火温度和手摇培养瓶。后来国家经济慢慢恢复,1962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知识分子有了空前宽松的发展环境,大家钻研业务,学外语的积极性很高,我在“逆境”中坚持自学到的知识都派上了用场,而且参加区内协作开展农业害虫基本调查等。可惜好景不长,一场灾难又降临到刚开始恢复元气的祖国头上。10年动乱期间我们夫妻都受到冲击,几次被抄家。在劳动中我照常发现问题,提合理化建议,心中对那些祸国殃民的人万分愤怒和痛恨。我坚信中央的正确领导必胜,知识有用,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虽然条件十分困难,我仍利用一切机会找文献看,搞翻译,搞力所能及的田间调查,为科普小报写义务性不署名文章。总之,什么都干,绝不让光阴白白浪费掉。国家需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国家要我们“向科学进军”的时期一定还会再来。

1976年“四人帮”被击垮后,中央出台一系列政策拨乱反正,领导人民开始真正走上繁荣富强的轨道。我此后不久被调到宁夏农科院植保所,此时我在宁夏已工作25年。由于在实践中为生产解决过一些燃眉之急的问题,做了大量“万金油”式的工作,也曾有一些基础理论学习、先进技术应用和一些重大病虫害问题方面做出过一些成绩,我的工作受到领导和同行的赞许。有人问我怎么能预见到有今天这样重视科技的形势。其实我只是觉得我们在祖先时代就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并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民族绝不会垮,也不该垮。我们炎黄子孙应该有志气把祖先当年的荣誉争回来。

1982年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向全国招聘人

才,由于老专家吴福祯先生向中央要求,将我调到该所。我从一个小省的科技人员调到中央单位,没觉得是“一步登天”,而只看作又一次岗位变动。我还是一如既往,听从组织调遣。初到时分到基本调查研究室,一年多后调麦虫室,两年多后又调棉虫室,我恰似排球场上的自由人,什么位置需要,我立即投入。好在我什么都干过,每涉足一行,都不是漂在面上应付,干一行就往里钻一行,没等钻透又让我换地方,对我都不太困难;到基本调查室是我的老本行,我从50年代就对小麦吸虫、麦蚜、黏虫等有过研究,只是棉虫,因宁夏基本不种棉花,只在教学工作中用过材料。当时我已50多了,感到为难,但组织坚持安排我去“加强”该课题组,我又到了棉虫组,并尽快熟悉了国内外有关该虫的前沿动态。

来北京工作26年,比起在宁夏,这里信息快,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参加多,申请获得国家大型研究项目的可能性大,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家重要调研任务和提出可供领导参考的建议,逐渐得到同行专家和领导的重视。我一个没读过研、没留过学、一毕业就长期扎到西北少数民

族地区,只凭“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热情努力工作的人,对国家给予我各种超值的回报,内心常深感不安,因为我没做出什么突出的业绩。当然,如果我当时分配在发达地区,能选定一个重要课题,一辈子研究下去,可能做出更突出些的成绩。但我更愿服从工作需要。植保是多学科交叉的一个综合性学科,必须宏观微观兼顾,实施多学科协作,才能解决问题,需要有人将这些有关学科串联起来。这种边缘工作不会有惊天动地的个人成就,但是绝不可或缺。只要有利于促进当前和今后的学科发展,即便做无名英雄,我也乐意。别人劝我,“领导总拿你当万金油使,老调换工作,你亏大发了”。我认为一点没亏,多年来不管我怎么换岗位也没偏离植保范畴,没偏离我追寻的目标。英国人有句名言,“射手的美名并非由于他的弓箭,而是由于他的目标”。我胸无成名成家之大志,只是做了点有益的工作,不为名利地位诱惑所动,面对压力能愈挫愈强,这都得益于50多年前给自己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改变祖国农业落后面貌而奋斗的目标。